

清史与戏说影视剧

“戏说”≠胡诌、滥编

——以《尚方宝剑》和《铁齿铜牙纪晓岚》为例

历史戏剧的创作自古就有，远的不说，近人如郭沫若、田汉等诸大师，每创作一部历史剧，总要参考正史、野史、笔记……多种，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才肯动笔。初稿写出后又广泛征求意见，才肯最后定本，一部新戏排出来，正式公演以前还要预演几场，征求意见。前些年，也就是电视剧刚刚兴起那几年，每排一部戏，特别是“正戏”（即与历史比较贴近的戏），也还要找些历史学家，特别是宫廷史家作顾问，咨询、征求意见。可是自从引进港台的“戏说戏”、“武打戏”后，因为上座率高，经济效益好（赚大钱，据说第二部《还珠格格》，琼瑶还未封笔，各电视台就竞相抬价，最后竟以 55 万元一集的“天价”成交），于是大陆制片商、剧作者便纷纷效法，趋之若鹜；再加上一个强强连手的明星演员阵容纷纷加盟（因为出场费高），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以至在很短时间内，就可以粗制滥造出一部电视历史剧来，甚至几乎到了“萝卜快了不洗泥”的地步。那真是，不管故事情节合不合理，不管时代背景、时间、地点合不合适，不管人物年龄大小，不管张冠李戴，频频发生，……只要故事波澜起伏，情节跌宕、惊险，吸引观众，就可以胡诌、滥编，甚至把黑

的说成白的，没有的说成有的，……如若不信，可举几例为证：远的如，在前几年上演的《宰相刘罗锅》中，把本来是纪晓岚（即纪昀）背地管乾隆皇帝叫“老头子”的故事，安在了刘罗锅头上。近者今年春节前后正在上演的《尚方宝剑》和《铁齿铜牙纪晓岚》（其中尤其是《尚方宝剑》一剧更为典型），不但内容、情节离奇，就是布景、道具，乃至字幕均错误百出。例如，在《尚方宝剑》中：（1）该剧的编导者连清朝皇帝、王爷的名字也懒得写了，任由观众去想吧；（2）当时中日两国均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特别是日本（即扶桑国）不允许只船片板出海，更不许一个人出国，如果发现有人出国回来就要杀头。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会有日本武士，甚至公主到中国来呢？（3）在清朝会出现众多百姓打着旗帜，举着横幅，振臂高呼口号，在大街上示威游行的场面吗？（4）在清人的屋室中又怎么会悬挂现代书画家刘炳森、欧阳中石的作品呢？……在《铁齿铜牙纪晓岚》中，（1）乾隆皇帝（弘历，1711—1799 年），纪晓岚（1724—1805 年），和珅（1750—1799 年），福康安（1754—1796 年）四人中乾隆年龄最长，他比纪晓岚大 13 岁，纪晓岚又比和珅大 26 岁，而和珅只比福康安大 4 岁，可是在该电视剧中前 3 位看起来年龄相仿，而福康安看起来还是青少年，不知为何如此化装？（2）和珅与福康安同是皇亲国戚（乾隆最钟爱的小女儿和孝公主，下嫁给了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福康安的姑母是乾隆的孝贤皇后，野史中甚至说他就是乾隆的私生子），二人均是皇上宠爱的重臣，特别是乾隆对福康安的“军功”（曾镇压过甘肃回民起义和台湾林爽文起义、

还曾带兵征伐过廓尔喀侵入西藏的军队、镇压过黔湘苗民起义等)非常欣赏,因此不免引起了和珅的嫉妒。于是他一手策划了其弟和琳弹劾湖北按察使李天培利用漕船为福康安夹带木植 800 件的大案,结果使福康安受到了惩罚。故此,福康安对和珅十分不满,两人矛盾很深,史载“宠权相埒,势不两立”。乾隆帝为了解决他们两人的矛盾,便常常采取把福康安安排在外省任事,而把和珅留在自己身边。可是在该剧却把和珅与福康安变成了沆瀣一气的亲密战友,甚至把福康安写成了和珅的助手,实在是不合适,如果把福康安换成其弟福长安那就对了。(3)康熙帝十四子胤禩的名字早在雍正初年就被改成了“允禩”,并被监禁起来,是乾隆帝登极后释放了他,并为他恢复了名誉的。可是在该剧他的名字仍叫“胤禩”,并说他让人配制毒药欲害皇上……,这是没有的事。(4)《阅微草堂笔记》一书,在乾隆年间并未结集出版,它是在嘉庆五年(1800年),由纪晓岚的学生盛时彦把他的《滦阳消夏录》、《如是我闻》、《槐西杂志》、《姑妄听之》和《滦阳续录》等合刊印行的。所以在该剧中不该有《阅微草堂笔记》的叫法。此外,在该剧的字幕中把明末清初的名妓(后来成为钱谦益的爱妾)柳如是名字写成了柳如氏(难道是姓如的嫁给了姓柳的吗?);把明朝的嘉靖皇帝的名字写成了“嘉静”(难道是因为嘉靖皇帝多年不上朝理政,他的年号就改成了“嘉静”吗?),以上仅举几例,可见一斑,特提出来,供大家思考吧。

笔者认为,电视历史剧诚然主要是为了娱乐、欣赏的,但它应该具有提高观众的素养,增加他们的知识,即寓教于乐的功

能，也就是向人们多少普及些历史知识；至少不能制造混乱，颠倒黑白，误导观众，以讹传讹，贻害后人。以至造成：“历史剧”使历史无奈、悲哀的局面。笔者希望影视工作者应多拍一些好的精品、佳品，给人们提供最好的精神食粮。同时也希望国家有关管理部门能出面干预、限制一下，使电视历史剧的创作健康发展。

我支持辩“王朝”之误者

近读何满子先生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的大作《辩“王朝”之误者之迂》一文，感触良多。有许多话要说，思来想去，到底是说，还是不说，一直举棋不定，好难受啊！真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现在决定写出来，与何先生商量商量。其实我也知道何先生此文的本义，并不是真的是要“骂”辩“王朝”之误者“不识时务”；“不知趣”；“不识相”，是“不通世故的迂夫子”……。因为他认为在“当今除了金庸文化、追星文化外，皇帝文化正是一大热点”的当口，尽管说的是一些“无可还价的说言确论”，却没必要“正儿八经地同那些除了制造‘戏说’之外别的都没有兴趣讲究的小说家、影视编剧者讲道理！”言外之意，就是别与这些人一般见识，“与其为此浪费时间和精力，不如去陪太太喝咖啡为得计”（鲁迅语）。一句话乃是：“吃饱了撑的，净干傻事！”（甚至有的人比何先生说得还难听：“如果有人还要把戏说剧考证一番的话，那他一定是‘二百五’”——见 2003 年 6 月 2 日，《北京青年报》刊载的《挖掘孝庄往事，抖搂康熙内幕，掀开乾隆老底，揭示慈禧隐私——尤小刚将秘史进行到底》一文）。笔者认为这一席话不无道理，但是又仔细想一想也不大妥，因为如果没有人出来“较真”，没有人对时下泛滥成灾，又肯定

后患无穷的“戏说”历史。进行匡正，任其谬种流传下去，后患将真是不堪想像的。因为有不少观众是把影视剧当成真实历史看的和传播的……常言说得好：“为人做事要认真”、“世上最怕‘认真’二字”……而世界上还偏偏有些人专爱“较真”，君不见有人爱“咬文嚼字”，有人爱对“牌匾”、“对联”说三道四，甚至还有个北京的小学生给北京电视台写信说，指出该台的“特别关注”栏目的“注”字笔画写错了……这一切看起来是小事，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它关系到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底蕴，是否能长期保存下去的大问题，不可不辩。就拿“王朝”一词，本来加在一个皇帝年号（例如，“康熙王朝”、“雍正王朝”、“乾隆王朝”……）就不合适，题名也根本不通。笔者认为“王朝”一词不是中国固有的名词，中国古代史书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王朝”一词。如果说到一个朝代，一般均是用“秦朝”、“汉朝”、“晋朝”、“隋朝”、“唐朝”、“宋朝”、“元朝”、“明朝”和“清朝”等等；或“大汉”、“大唐”、“大宋”、“大明”、“大清（有时也称“大清国”）等等；或“皇唐”、“皇宋”、“皇明”、“皇清”等等；或“唐皇朝”、“宋皇朝”、“元皇朝”、“明皇朝”和“清皇朝”等等。如果专指明清时代某一位皇帝在位期间，则往往称其为“嘉靖朝”、“万历朝”、“顺治朝”、“康熙朝”、“雍正朝”、“乾隆朝”、“光绪朝”等等。而“王朝”一词最早是在古代西方（特别是欧洲）的一些国家常用，因为在古代欧洲多是由一些“王国”、“公国”组成；而且这里的“王朝”多指的是由一个家族建立的政权的全过程始终，绝不是指某个人在位期间。例如，英国的“斯

图亚特王朝”、法国的“波旁王朝”、德国的“哈布斯堡王朝”、“霍亨索伦王朝”、“俄国的“罗曼诺夫王朝”等等；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个人统治时期称为“王朝”的。例如，绝对不能称什么“查理二世王朝”、“亨利第三王朝”、“约瑟夫二世王朝”、“彼得一世王朝”、“叶卡特琳娜二世王朝”和“尼古拉二世王朝”等等。虽然辛亥革命后，在我国的各种著述中也出现了诸如，“唐王朝”、“宋王朝”、“明王朝”、“清王朝”之类的提法，但还没有人把一个皇帝的年号称为王朝的提法，只有近年来的影视剧是个新创。鉴于此我支持辩“王朝”之误者的说法，不管有人说我“好事”也好；迂腐”也好；杞人忧天”也好；二百五”也好……爱说什么，爱骂什么随便吧！

“戏说戏”、“秘史剧”之风何时了？

据传媒披露得知：这边“戏说戏”《还珠格格3》即将播放，《铁齿铜牙纪晓岚3》也正在积极筹划；那边“秘史剧”《孝庄秘史》刚刚播完，《皇太子秘史》又要粉墨登场。并扬言要“挖掘孝庄往事，抖搂康熙内幕，掀开乾隆老底，揭示慈禧隐私——××××将秘史进行到底”（见《北京青年报》2003年6月2日A19版）。近年来“戏说戏”、“秘史戏”，以至“王朝戏”，简直热得不得了，真可谓“你方演罢，我登场”，从来就没有断档过。殊不知这些影视剧的炮制者，包括策划、编剧、制片、导演，以至演员……大都缺乏专门的历史知识，缺乏中华传统的文化底蕴，因此导致了剧情严重违背历史真实，歪曲了历史本来面目，有悖于常理，更谈不上熟悉当时的典章制度和一般社会习俗，乃至出现了许多令人惊异、齿冷的纰漏，甚至为了哗众取宠，还闹出了不少笑话。而有些观众由于知识和素质所限，把这些影视剧当成历史来看，误以为历史上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因而“见怪不怪”，“习以为常”，甚至把本来是错误的东西，却当成了正确的接受下来，并进行传播扩散，如果不及时给予指正，久而久之，则将后患无穷，不堪设想。值得一提的是，当前最为遗憾的是理论界和文化艺术界的人士虽有少数人出来说话（著名学者如吴小如先

生、资中筠先生、何满子先生等），但并未引起大多数人的关注和重视；反而把那些少数“较真”的人，看作是“迂腐”、“不知趣”、“二百五”……进行嘲笑。笔者认为这是不妥的，以下随便从几个方面举些事例，看看是不是应该“较较真”。

一、胡编滥造，歪曲历史事实：（1）郑成功的儿子郑经明明是病死的，可在《康熙王朝》中却成了自己“抹脖子”而亡。（2）和珅一生从来就没有被发配到过新疆，更没有被罚苦工去采过玉石。但在《铁齿铜牙纪晓岚》中，这样的场景出现了。（3）纪晓岚很早就娶妻生子了，可是在《铁齿铜牙纪晓岚》中却始终没结过婚，反而弄出一个少女杜小月瞎掺合；在今年春天《三联生活周刊》杂志社举行的一次读者座谈会上，有人问该剧编剧之一，“纪大烟袋”什么时候结婚¹⁹？他竟说：先不让他结，叫他跟杜小月再闹一阵子，下一本《铁齿铜牙纪晓岚》，我让杜小月出国，让她跟马戛尔尼一起去英国……殊不知马戛尔尼这次访华，并不成功，他们一行可以说是被清政府“最文明的驱逐”出中国的，怎么能带着个中国女子出国呢？况且当时中国闭关自守，是不允许国人随便走出国门的，更何况还是女子呢。无独有偶，清朝与日本在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前，并没有建立正式邦交关系，因此就不会在中国朝廷上出现日本公使或使节，但是偏偏在影视剧中一再出现了。（4）乾清宫中高悬的“正大光明”匾额，明明是顺治皇帝写的，可是在《康熙王朝》中却成了康熙皇帝的手笔——（5）“八国联军”总司令德国人瓦德西，在古装戏《钱王》中却叫“瓦西德”；同样，德国外交官（公使）克林德是在东单

西总布胡同西口被杀，在《钱王》中却说成是在东交民巷被杀。

二、不懂当时的典章制度和一般社会习俗：（1）不了解清朝职官制度，胡编滥造出一些官职。例如，清朝从来就没有什么“侍卫总管”、“江淮总督”、“迪化都统”、“守陵总管”、“江南织造”……之类官名，但在《梦断紫禁城》等影视剧中都出现了。（2）“孝庄”本来是谥号，是康熙皇帝给其祖母上的谥号，全名应为“孝庄文皇后”，是后人对她的尊称。她自己活着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这个名字，可是在《康熙王朝》中，却出现了“我孝庄长”，“我孝庄短”的荒唐局面。（3）京剧在乾隆年间还没有形成，当时在京城流行的是秦腔、昆腔和梆子戏等地方戏。在乾隆晚年至嘉庆年间三庆、四喜、春台和和春四大徽班才陆续入京，并把“二黄”戏带进京城；道光年间，湖广（今湖北、湖南）一带流行的“西皮”，（即“汉调”，）传到京城，以致“徽汉合流”，同时还吸取了其他一些地方戏种，形成了“皮黄戏”。后来它又经过若干演变，逐渐脱离“徽班”、“昆剧”最后在道光年间才形成了京剧。因此在康乾时期，人们不可能看京戏、唱京戏。可是在《铁齿铜牙纪晓岚》和《梦断紫禁城》等影视剧中，动不动就出现唱京戏的场面，和珅来不来还哼哼几句京戏，这可能吗？并且在演戏当中，观众不时就“鼓掌”、“叫好”其实“鼓掌”是近代剧场中才出现的事，至于“叫好”、“喝彩”那也不是随随便便的乱喊，弄不好就是“喝倒彩”了；而影视剧中许多地方都是“喝倒彩”，简直是乱喊一通。（4）皇帝“遗诏”是皇帝临死以前交给顾命大臣的（清朝雍正以后往往放在乾清宫中“正大光明”匾后面），没有把皇帝遗诏贴在皇太后居住的慈宁宫墙壁上的，可是

在“戏说戏”中就是这么干的。(5) 清朝文武官员所穿戴的“补服”也叫“补子”是有严格规定的，文官穿禽鸟“补服”，武官则穿兽类“补服”但是在影视剧中却常常是穿反了。(6) 在许多影视剧中凡达官贵人住宅的大门口都要挂着一块匾，上写“×府”，其实在清朝（包括整个封建社会）不是这样的。住宅也与穿戴一样，也是分等级的，不能僭越，否则就是犯罪。“府”只能用在“王爷”，或身份特别高贵的人家，一般叫“××王府”；其他人的住宅，只能称“宅”、“第”或“寓所”……。还可以举出许多事例，这里就不一一罗列了。总之现在“戏说戏”、“秘史剧”太多太滥了，往往一位皇帝，一位皇后，一位大臣，反反复复地拍摄，拍完“王朝”，拍“戏说”，拍完“戏说”，拍“秘史”，没完没了，剧情大同小异，且“萝卜快了不洗泥”，几个月就是一部，胡编乱造，根本没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结果弄得观众倒了胃口，看累了眼球，看腻了，看不耐烦了。纷纷投书报端，提出“帝王戏”还有完没完？“‘皇室风’刮得现代人几乎天天与皇帝打交道，而那几个演皇帝的专业演员却演得千人一面，让人看得精疲力尽。影视剧推向市场，既要社会效益，又要经济效益，这是个事实。但作为观众，更企盼制作者将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追求影视剧的创作个性，以独到的视角，独到的立意和独有的题材来征服观众。而眼下这种急功近利的跟风行为只能使观众厌倦（见 2003 年 6 月 25 日和 2003 年 7 月 2 日《光明日报》B1 版）。鉴于此笔者真诚的提出“戏说戏”、“秘史剧”该刹刹车了。

从电影《郑成功》谈郑成功与日本的关系

前不久许多影院热映新片《郑成功》受到观众好评，使笔者不禁想起了郑成功一家与日本的一些事情，于是便写了此文，供读者参考。

郑成功作为一位杰出的爱国者与民族英雄，三百多年来，他一直为中国人民景仰与缅怀；同时由于他与日本有非同一般的血缘关系，也长期受到日本人的敬重、怀念和传颂。例如，现在日本九州平户市川内浦地方，还保留着他的故居以及他亲手种植的竹柏树。近年来日本人为了祭祀他，还在他的故居附近丸山公园内修建了一座纪念他的香灵庙。

以郑成功为中心的郑氏家族与日本的关系很深。从其父郑芝龙至其孙郑克塽，四代人前后 60 余年间，一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与日本保持着联系，而且郑成功本人与日本人还有着血缘关系；可以说他是一位具有汉和民族血统的华侨。他的胞弟七左卫门（又名田川次郎左卫门）的后代至今仍在日本生活着。据调查得知，七左卫门的 11 世孙郑审一（原日本法政大学教授）1969 年去世；第 12 世孙福住（郑审一子，1955 年时改姓“福住”），现居住在横滨市。本文拟从血缘、乞师和贸易等方

面加以阐述。

一、郑氏一家与日本及其抗清复明活动

郑成功（1624—1662 年），俗称“国姓爷”，又称“国姓成功”，“赐姓成功”、“朱成功”等。原名郑森，字明俨，号大木，在日本时，乳名叫福松，原籍福建南安石井乡。

其父郑芝龙，字曰甲，号飞黄，乳名一官（或“郑一”），是一个海商兼海上走私集团的头目。早年从事中日及东南亚各国间的海上贸易，曾多次到过日本。他 18 岁从家乡前往广东香山澳（即“澳门”），投靠于舅父海商黄程，帮助黄做一些事务性工作，并在此学会了葡萄牙语，同时还信奉了天主教；后被多次派遣随商船押货至日本长崎、平户等地。郑芝龙首次去日本是在明朝万历四十年（日本庆长 17 年，1612 年），他们的商船运载着大量生丝到长崎进行贸易，并于同年 8 月 15 日，在骏府（今日本静冈县）觐见了日本德川幕府（亦称“江户”幕府）的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并献上了一些名贵的中药材与中国书籍《经国雄略》20 卷，同时还回答了德川家康有关明朝情况的一些询问，受到了德川家康的款待。

大约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 年）左右，海商袁进、李忠和颜思齐等人，在台湾建立了自己的势力，并开始以台湾为中转基地进行贸易。郑芝龙当时归属于颜思齐名下，受其制约。明朝天启三年（1623 年），郑芝龙随颜思齐到日本九州的平户进行贸

易，在经商中经平户藩主松浦介绍与当地入田川氏（也称“翁氏”）结为夫妻，第二年七月十四日生长子郑成功。当时日本当局对郑芝龙很重视，如，“长崎王使芝龙主舶”；平户藩主松浦也送给他宅邸供其居住。天启五年（1625年），郑芝龙随颜思齐等人分乘 13 艘大船到台湾，在基隆附近安设寮寨，安抚土藩，不久颜思齐病逝，于是他便成为了一个大海商兼海上走私集团（即所谓“海盗”）的头目。当时台湾南路已为荷兰侵略者占据，为了对抗荷兰人的侵略和占据，郑芝龙在崇祯元年（1628年），以每人“给银三两，三人给一头牛”为条件，从福建动员了一万多人渡海到台湾垦荒。此后，为了冲破明朝政府的海禁，郑芝龙曾以台湾为基地，率众袭击福建漳浦，杀死守官；并占据金门、厦门，并控制了台湾海峡。后来郑芝龙接受了福建巡抚熊文灿的招抚，回到了家乡，先后任明军的游击、总兵等官，并开辟了由泉州直达日本长崎的航线，继续控制着中日间海上贸易权。

郑芝龙一生共有五位妻子，她们分别是颜氏、田川氏（翁氏）、陈氏、黄氏和李氏等。天启四年（1624年，日本宽永元年）农历七月十四日（公历 8 月 27 日），田川氏正在平户“千里浜”海滩捡拾海贝、海菜时，忽然感到一阵阵腹痛难忍，她预感到即将分娩，于是她急忙走到一块岩石上，田川氏便生下了一个男孩，这就是郑芝龙和她的长子郑成功，后来人们便将这块石头叫做“儿诞石”（又叫“生儿石”）。大约经过二百年后，就在郑成功的诞生地，日本人建立了一块纪念碑，碑上镌刻着由平户藩儒臣叶山铠轩撰写的长达 1500 字的碑文。

郑成功的童年是在日本平户度过的，在他七岁时（崇祯三年，1630年），离开母亲只身回国，住在福建南安安平镇（今晋江安海镇），并开始读书生活。后来其母田川氏经与日本当局交涉，达成协议留下次子七左卫门（1629年生）在日本，她自己渡海来到福建郑氏祖居，照顾郑成功生活和学习。崇祯十一年（1638年）郑成功考中秀才，同时他的武功也大有长进。崇祯十四年（1641年），娶惠安进士董飏先侄女为妻。为了进一步深造，他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来到南京，在国子监继续攻读儒学。在他的老师中不少人是当时江南的名士，如钱谦益等人，据说“大木”之字，就是钱谦益给他起的。

1644年春夏之际，清军在多尔袞的统帅下进入山海关，由于吴三桂的协助，打败了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军，顺利攻入北京城。明亡后，1645年郑芝龙一家父子、兄弟均拥戴故明唐王朱聿键称帝，在福州建立了隆武政权，年号“隆武”。郑芝龙因此先后被封为平虏侯、平国公等爵。郑芝龙之弟郑鸿逵也被封为定虏侯、定虏公。郑成功当时已是二十多岁青年，才貌出众，文武双全。一次郑芝龙携子郑成功谒见隆武帝朱聿键，朱聿键见成功相貌威严，仪表堂堂，很是赏识。于是便问了他一些问题，他对答如流；隆武帝感慨万千，手扶其脊背喃喃地说：“恨无一女配卿，卿当尽忠吾家，勿相忘也！”同时赐他姓“朱”，改名“朱成功”，并封其为“御营中军都督”，仪同附马。自此皆以“国姓爷”称之而不名，同时还让他协理宗人府事务。

隆武二年（1646年），隆武帝又下谕旨封成功为“忠孝伯”，

赐尚方宝剑，挂招讨大将军印，镇守闽赣边界。当时郑氏家族把持着隆武小朝廷的朝政，但在郑芝龙兄弟子侄们中，大多数人都不是实心实意地拥戴隆武帝，他们出于自己的私利，拥兵观望，消极抗清。只有郑成功义无反顾，决心以身许国，忠心耿耿地效忠于隆武帝。此时，清兵已攻下浙江，南明监国朱以海逃亡海上；同时，清军还向郑芝龙发出了招降的信息。在这种形势下，郑芝龙等决心向清军投降，于是便主动放弃闽赣交界上的仙霞关，率领部下退回闽南安平老家。同年（1646年）八月，清军自仙霞关长驱直入福建，很快便攻下福州，隆武帝仓皇逃跑，后被清军杀害。郑成功力劝其父郑芝龙要忠于朱明政权，不要投降清朝，但郑芝龙根本不听。在这种情况下，郑成功只好带领一支部队退守金门。

郑芝龙降清后，曾多次奉主子之命招引儿子郑成功降清，但均遭到郑成功的坚决拒绝和严厉地斥责。当郑成功得到隆武帝朱聿键及其后妃遇难消息后，心情非常悲痛，他命令全军缟素，设灵牌望北哭祭。不久清军攻至安平，芝龙等人被清军挟持北上。清军又在郑氏老家抓住郑成功的母亲，亦欲挟其北上。但“成功生母倭妇翁氏手持剑不肯去，强之再四亦不行”。最后她毅然用剑剖腹而死。

时为南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年）11月30日，享年45岁。郑成功得知母亲自杀身亡消息后悲痛万分，他立即率兵赶到安平，此时清军已撤回泉州。郑成功料理了母亲的丧事后，面对国破家亡的悲惨局面，化悲痛为力量，毅然决然地将自